

高阳历史小说系列

粉墨春秋

中
春梦无痕



高

I24 / 529

高阳历史小说系列

粉墨春秋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 03 号

本系列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我社在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高阳历史小说系列

粉墨春秋

高阳 著

责任编辑:苏 斌 朱 晓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30.75 字数 638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7-80617-375-7/I·96

定价:38.00 元(上、中、下)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第二部

春梦无痕

目 录

第二部

1. 回风小舞	361
2. 悔不当初	369
3. 亦敌亦友	395
4. 满洲真相	403
5. 正气犹存	423
6. 客中惊艳	452
7. 扶倾济危	471
8. 春梦无痕	484
9. 新知话旧	509
10. 美机东来	548
11. 大海冤魂	563
12. 力争上游	577
13. 危机暗伏	596
14. 另开新局	614
15. 侠林恩怨	627

1 回风小舞

司徒雷登愿作调人。

其时为日本新闻界称之为“和平运动参谋总长”的周佛海，对“组府”正起劲之时，在上海招兵买马，许下了好些“部长”、“次长”，而且连“新政府”的预算都编好了。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以致于哪一天才能粉墨登场，却是个未知数。

一个问题是青天白日旗上的飘带。汪精卫坚持要取消，而日本军部特地召集华中、华南、华北 3 个派遣军的参谋

长，在东京开会研究，一致表示：青天白日旗上挂飘带，作为“汪政府”的“国旗”，已是最大的让步；如果连这条飘带也要取消，变成敌我不分，不但在实际作战上有妨碍，最严重的是会影军心，万一发生哗变情事，勿谓言之不预。

提出这样的警告，日本军部自然坚持原议；汪精卫也知道事实上有困难，只能拖着再说。

再有一个问题是今井从香港回日本以后才发生的。原来关于“汪政府”的国际地位问题，周佛海曾经与日本外务省的代表加藤谈过，“汪政府”自称为“还都”，并非成立“新政权”，所以无所谓“承认”问题。周佛海只要求日本派遣“大使”向汪精卫呈递“国书”。

加藤的答复是，日本派特使不派大使，不递国书。周佛海表示，倘或如此，组成“新中央政府”毫无意义。谈得一场无结果而散。

当然，让步的必是骑虎难下的一方，周佛海跟汪精卫商量，用与日本当局同时发表宣言的方式，作为日本对汪精卫“组府”支持的表示。这个方式是影佐祯昭所同意，而且认为很合理的；但到东京去了一趟，他的态度改变了。

“贵方发表宣言，日本方面不便阻止；但日本不发表宣言响应，不表同意，亦不否认，采取默认态度。”影佐接下来将与今井商量好的解释说了出来：“因为公然承认，则日本右派及帝国主义者，必然反对，不能不事先顾虑。”

周佛海愕然，“汪先生的宣言，日本固不否认；可是，”他问：“日本的议员或者记者提出询问；日本政府如果稍为表示：这是中国片面的希望。哪一来，汪先生宣言的效力，岂不是完全打销了？”谈来谈去谈不拢，只好约定第二天一起去见了汪精卫再作道理。

到得第二天一早，影佐忽又不速而至；一见面便问：“汪先生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是否熟悉？”

司徒雷登是美国人，他的父亲是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所以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周佛海认识此人，并不相熟；如今听影佐这一问，料知有话，考虑了一会，还是据实相答。

“他到上海来了；要由香港转重庆。我昨天跟他见面。”影佐紧接着说：“他对全面和平倒也很热心。”

一提到这一点，周佛海心情有些矛盾，全面和平固然是内心的希望；但一谈到全面和平，对于“组府”便横生好些障碍；日本军部不肯发表宣言响应，亦就是为了留下跟国民政府的和谈之路。如今横刺里又杀出来一个司徒雷登，眼前的情势，恐怕要弄得很复杂了。

心里是这么想，表面上当然表现得颇为兴奋的样子，“喔，”他问：“他怎么说？”

“他说，他在北平跟王克敏谈过，希望王克敏出任蒋委员长及汪先生中间的调人。”

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周佛海心想，司徒雷登在华多年，何以政治行情，一无所知？王克敏具何资格，能任此调人？

“不过，我们从另一方面接到的电报，与此不同。”

“所谓另一方面，是哪一方面？”

“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影佐停了一下说：“据说，司徒雷登本人想出任重庆与东京间的调人，托王克敏向冈村大将，探询意向。”

这两种情况，大不相同；王克敏虽没有资格担任重庆与东京的调人，但司徒雷登有美国的背景，甚至可能是华府白宫或国务院的授意，担任重庆与东京的调人，不但够资格，

而且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

“那么，”周佛海问：“冈村大将作何表示。”

“冈村大将觉得这件事不应该由他答复；所以打了电报给西尾大将，请求指示。”

西尾就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周佛海心想，此事即使是西尾，亦未便贸然作决定性的答复，便即问说：“西尾大将当然要跟东京联络？”

“是的。一方面跟东京联络；一方面要我来联络，西尾大将想知道汪先生跟周先生的意向。”

听得这话，周佛海大感兴奋；因为西尾寿造没有撇开汪精卫，证明日本军人还是讲交情的。否则，重庆与东京，通过司徒雷登直接联络，汪精卫成了局外人，不仅没有发言的余地，而且连内幕都无从获知，那时的地位，岂不尴尬？

“周先生，”影佐最后才道明真正来意：“司徒雷登提出要求，希望通过我们的关系，请你跟他见一次面；谈谈汪先生跟你对全面和平的意见。”

这一下，周佛海不由得踌躇了。原来他的根本目的是：“组府”第一；谈和其次。以为有了“政权”在手里，就是有了一笔政治资本。但“组府”之事，从“高陶事件”以后，各方的空气不佳；全亏得周佛海在那里极力拉拢。如果传出消息去，说他与司徒雷登有所接触，大家都会想到：必与中日谈和有关；既然要停战谈和了，“汪政府”当然不会再出现。见机而作，避得远些；否则“新贵”做不成，落个准备“落水”做汉奸的名声，太犯不着。这一来，不就等于垓下的楚歌，一夕之间，楚军瓦解！其事不可不慎。

但是，尽管影佐一直是支持他的；却由于他也一直跟影佐表示，只要有全面和平的机会，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

如今机会来了，倒说退缩不前，岂非言不由衷，平白让人把他看得矮了半截？

因此，他决定采取拖延策略，“要见面，就要谈得很具体；不然不如不见。”他说：“容我先跟汪先生谈了，再给你答复。”

事实上他没有去见汪精卫；而是跟他的智囊之一，岑春煊的儿子岑德广去商量。岑德广毫不迟疑地说：“这机会当然不容错过。不管谈些什么，你总要跟他会一面。”

周佛海想了一下说：“问题是，我去看他，他来看我，都不方便。消息一泄漏出去，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

岑德广当然了解他的言外之意，“那也容易！”他说：“你跟中间人约定时间、地点，到时候我派车去接，在我这里见面。即或消息泄漏，只说不期而遇就是。”

“不错，不错！人生何处不相逢？”周佛海认为这样做不露痕迹，同意照办。

“公博，快回来了吧？”岑德广又问。

陈公博早又回香港了，他对“组府”本不感兴趣，从高陶事件以后，态度益发消极，此时岑德广问到，周佛海叹口气说：“汪夫人预备亲自去劝驾，来不来未可知！”

“有公博在这里就好了；你跟公博一起跟司徒雷登见面，可以表示和平的愿望是一致的；以后报告汪先生，有公博在场也比较好说话。”岑德广接着问道：“你是不是先要跟汪先生谈一谈？”

“你看呢？”

“我觉得事后告诉他比较好。”

周佛海考虑了一下，点点头说：“有什么事，只有我先挺下来再说。”

*

见面的日子，定在2月12日；到了约定的时间，岑德广派了一辆车，将司徒雷登及他的秘书傅泾波，接到了愚园路岐山村的住宅，周佛海已经等在那里了。

经过短短的一番寒暄，司徒雷登用一口可以乱真的杭州话说道：“我等于一个中国人。”

就这一句开场白，周佛海与岑德广对这个高大的美国朋友，立即有了一种很微妙的亲切感，不约而同地深深点头，表示领会到他的立场。

“蒋委员长励精图治，这几年来国内无论物质上的建设，精神上的培养都令人刮目相看。不幸地爆发了七七事变，基本上也就是日本看到中国的进步，内心不安之故。”

周佛海接口说道：“我要说明，日本看到中国进步，内心不安，诚然有之；不过那是日本军阀的心境，而且也只是——部分日本军阀，像松井石根、杉山元之流。”

“是的！因此，中日之间的和平，在日本方面出现了机会；现在是中国方面的问题。将近两年的作战中，已证明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尚不足与日本相敌。如果此时求得合理的和平，给英明的蒋委员长几年生聚教训的时间，仍旧可以跟日本一决雌雄。”司徒雷登紧接着以郑重的神色说道：“这完全是我把我当作一个中国人所说的话。”

“我完全能够理解。”周佛海说：“事实上，我们内心中也是这样想法。”

“你所说的‘我们’，想必包括汪先生在内。对于汪先生倡导和平，我极表赞成；不过传闻汪先生将另组‘政权’，如果所传是实，那是中国的另一大不幸。”

“喔，”周佛海以极沉着的态度说道：“请司徒博士作个简单分析。”

“很显然地，在对外作战时，内部和战的步骤，不能一致，已是一个弱点；如果造成分裂，更非国家之福。”

“司徒博士的看法，就一般而言，是不错的。不过，一时分裂的现象，也许反可以发生加速复合的力量。”

“分裂之后再复合，裂痕总归存在的。”司徒雷登不愿在这个问题引起争执，话锋很快地一转，“我这次到重庆，会谒见蒋委员长；很愿意将汪先生方面的真意转达蒋先生，谋求一个共济之道。今天想跟周先生见面，就是为了想了解汪先生方面的意见。”

“司徒博士的热诚，我们感激而且佩服。不过，以蒋先生目前的处境，已无法与日本交涉和平；目前进行组织‘政府’，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立场，以便利进行交涉。如果我们的‘政府’在组成以前，重庆跟东京的和谈，已经在进行；那么成立新‘政府’这一层，自可从缓。倘如重庆与东京能够达成停战的协定，则新‘政府’虽已成立，亦可随时取消。”

这样彻底的表示，司徒雷登为之动容；便进一步问道：“照周先生的说法，不知道汪先生是不是同意？”

“我们可以完全代表汪先生，保证履行我刚才所说的一切，请司徒博士代为向蒋先生表明：我们所做的事，纯在求取全面和平，决不会成为重庆与东京和谈的障碍。”

岑德广所提出的，如果和谈实现，希望美国居间保证。周佛海不赞成他的这种主张，因为不论如何，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事，邀请另一国居间保证，无异自请他国来干预内政；不过司徒雷登已经很爽快地作了承诺，也就不必再提任何异议了。

“周先生，”司徒雷登又说：“我大概在月底才会从上海动身；如果汪先生还有什么意见要我带到重庆，我是乐于效劳的。”

周佛海知道他的言外之意，对于他刚才所说的，可以代表汪精卫保证“新政府”将不会成为和谈障碍的声明，希望进一步获得本人的确认；因而毫不迟疑地答说：“在司徒博士启程以前，不妨再叙一叙；我可以把汪先生在这方面的意见；详细奉告。”

2 悔不当初

陈公博、周佛海悔杀当年
参加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

谈话到此，可说是到了圆满结束的时候；但司徒雷登兴犹未尽，而傅泾波却又提出一个深具意义，也令人深感兴趣的问题。

“我们研究过汪先生和周先生倡导和平的动机之一，是为了反共；华北日军司令多田骏曾经表示，希望蒋委员长改变容共抗日的政策；而据说‘新政府’使用的青天白日旗上面，有‘和平、反共、建国’的字样，说明了中日和平与反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大家都知道，周先生与陈公博先生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催生者；由发起共产党到坚决反对共产党，是什么力量来推动了这个180度的转变？”

“理论！”周佛海平静而简洁地答了这两个字；“不过公博是就经济方面看透了马克思主义根本不通；我是从鹿儿岛七高毕业以后，升学京都帝大，听了河上肇博士的课，又

彻底研究了著作，从政治方面看透了马克思主义在当前的中国，根本不能实行。”

“周先生参加共产党，是在七高时代？”

“是的。那是在 1921 年夏天，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 13 人；代表上海、北平、长沙、广州、武昌、济南这 6 个地区的 57 名党员。”

“只有 57 个人？”

“是的。像广州，公博跟谭平山叔侄一共 3 个人，就成立了广州共产党。那次广州的代表就是公博；我跟毛泽东是长沙的代表。但是所谓‘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因为——。”

因为“北李”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暑假正是整顿内部的时候，他身为馆长，不容他请假南下；“南陈”陈独秀则方为陈炯明聘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亦以同样的理由，无法分身。因此，这一次“大会”的主席，就由曾经去过俄国的张国涛担任。

“据公博后来告诉我，他之脱离共产党，就起意于对张国涛的不满；公博一向喜欢观人于微，当时张国涛的处置，我倒并不以为不当，而公博看出来了，事情是这样：最初决定，开会为了安全问题，应该逐日更换地点，但一连 4 天，都在法租界贝勒路，上海代表李汉俊家开会。公博便问张国涛何以与原议不符？你们知道张国涛怎么说？”

张国涛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的理论，而是克伦斯基的理论；他是黄色的，不是赤色的。原来俄国 1917 年发生的“二月革命”，是军队不奉政府弹压罢工工人的命令；国会亦起而反对政府；俄皇下令解散国会，而国会置之不理，成立了临时政府，由克伦斯基担任主席。不过，临时政府虽由专制改为共和，但实权操在资

产阶级手中，所以当时认为“二月革命”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在作为俄共党史的“简明教程”中，更一再强调，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自然水火不容。

然则这一连4天在李汉俊家开会，又有什么关系呢？张国涛说，因为李汉俊的立场有问题，所以在他家开“大会”似乎已引起他的恐慌；“他越是恐慌，我们越要在他家开会！”张国涛这样很得意地对陈公博说；脸上的神色，仿佛是虐待狂者获得满足时的反应。

陈公博却大起反感，认为既属“同志”，应该相见以诚，相待以义；张国涛这样做，不仅故意与李汉俊为难，甚至连“同志”的安全都不顾，共产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便有这种同舟敌国的现象，使得陈公博内心的满腔热情，顿时降到零度。

再有件事，气得陈公博几乎要退席。有一件提案是：禁止共产党员参加政治，连教员都不许当。也许张国涛是希望逼着共产党员去当“无产阶级”的“工农”；以为参加政治就是做官，与组织的要求不符，但何至于连从事教育都不许？岂非荒谬绝伦！

尽管陈公博全力反对，但在张国涛坚持之下，居然照案通过。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再开会时，张国涛自动提出取消前一天的决议；陈公博自然要提出质问。张国涛的答复是：俄国代表的意见。

原来那时“第三国际”有两个代表派在中国，一个叫吴庭斯基，一个叫马林；组织中国共产党，即出于吴庭斯基的策动，在这次“全代会”中，俨然君临的姿态，陈公博本就有些看不惯；现在听张国涛恬不知耻地表明，一两

个俄国人竟可推翻“大会”通过的议案，自然气愤难平；疾言厉色地说：“这样子不必开什么会，只由俄国人发命令算了！”当场冲突，不欢而散。

到得最后一天，终于出麻烦了。他们开会总是在晚上，这天人还没有到齐，正在闲谈时，李家的仆人上楼报告，说有一个面生可疑的人在问他：你们经理在家不在家？一听这话，深具秘密工作经验的吴庭斯基和马林，立刻主张解散。于是张国涛领头，纷纷下楼，开了前门逃散；上海的“弄堂房子”习惯由后门出入，所以前门反变成比较安全的“太平门”了。

陈公博本来心恶张国涛不顾“同志”危险，专跟李汉俊为难；及至急难来时，先就逃得快，那就不但心恶，而且心鄙了。此时他一方面觉得有跟李汉俊共患难的必要；一方面也想了解张国涛何以对李汉俊的恶感如此之深，所以留下来不走，跟李汉俊谈谈。

李汉俊开了一听长城牌香烟，一人抽了一支，谈不到三五句话，3个法国“三道头”带着4个“包打听”上楼来了。

“不准动！”有个包打听大喝一声。

李汉俊想尽主人之礼，坐在那里探手去取烟罐，准备敬客，那知手刚一伸，又吓一大跳！

“叫你不准动，就不准动！”声音愈来愈粗暴了。不许动，不许说话，甚至不许喝茶——怕茶中预置了毒药；不过烟罐就在陈公博面前，他取烟抽，却未被禁；一支接一支，等搜索了一个多钟头，又问了李汉俊许多时候的话，恰好48支烟抽完，就轮到陈公博受讯了。

陈公博不懂法语，“包打听”翻译着说：“总办大人问